



导 言

一、人口经济学的缘起

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反思“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的过程中,人口经济思想日趋活跃。其后,经过30多年的酝酿和二战以后人口爆炸的洗礼,20世纪70年代初期,人口经济学逐渐形成。人口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古希腊的思想家色诺芬(Xenophon)、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都探讨过人口与土地、人口与国家兴衰、人口与社会治乱的关系等,这些实际上是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萌芽。

经济学产生以后,经济学家大都重视人口经济问题的研究。亚当·斯密(A. Smith)、大卫·李嘉图(D. Ricardo)、马尔萨斯(T. R. Malthus)、萨伊(Jean-Baptiste Say)、约翰·穆勒(J. Mill)一直到马歇尔(A. Marshall)都从经济角度研究过人口问题,都把人口看作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内在因素,人口与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关系、人口与财富增长的关系、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等都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马尔萨斯是最早正式开展人口研究的经济学家,在《人口论》(1798年)中,他在“两个公理”(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的基础上,把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归结为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提出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因而生活资料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增加,但人口的增加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主张对人口增长进行抑制。《人口论》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理论是以批判马尔萨斯为开端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1861—1863》、《资本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形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和“两种生产”理论。但是,在当时,这些问题还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关于人口增长、人口健康与强壮、人口增加与共同效率关系的研究,颇引人注目,并将人口因素纳入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倾向的分析框架。随后,现代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凯恩斯(Keynes, J. M.)和汉森(A. Hansen)也很重视人口问题的研究,他们把人口因素纳入有效需求理论之中,分析了人口增长、资本投

资、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学家,还是现代经济学家,他们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都还只是将其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专门课题和独立学科提出来加以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事情。1939年英国经济学家雷德韦(W. B. Reddway)出版了《减少人口经济学》一书,首先使用了“人口经济学”这个命题。在书中他对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进行了分析。随后,穆克奇(Mukerjee, 1943)出版了《人口政治经济学》,探讨了人口与经济福利的相互关系。斯彭格勒(J. Spengler, 1947)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概论》一文,论述了人口经济学的内容、梗概。法国人口学家索维(A. Sauvy, 1952)出版了《人口通论》,该书上册《增长经济学》提出了“经济适度人口”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相继发表了有关人口经济学的著作和论文。1972年,斯彭格勒《人口经济学》出版,该书具有广泛的影响,被看作西方人口经济学成熟的标志。随后,《人口增长经济学》(J. L. Simon, 1977)、《人口经济学导论》(J. D. Piltchford, 1974)、《人口发展中的经济因素》(A. J. Coal, 1976)、《经济学和人口学》(Bowen, 1976)以及日本安川正彬的《人口经济学》相继出版,并产生了较大影响。与此同时,欧美一些大学开设了有关人口经济学的课程。这实际上宣告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人口经济学的诞生。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不是对人口经济关系做零星的论述,而是把人口经济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学的分化,人口经济学也呈现出分野的趋势——宏观人口经济学和微观人口经济学的轮廓日益清晰。以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伊斯特林(R. A. Easterlin)为代表的人口经济增长长波理论,以舒尔茨(T. W. Schultz)等为代表的人口投资理论,以索维为代表的经济适度人口理论,以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悲观人口经济理论,以J. L. 西蒙为代表的乐观人口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以舒尔茨、卢卡斯(R. Lucas)、罗默(P. Romer)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博塞罗普(Boserup)、诺斯(D. C. North)、拉坦(V. Ruttan)等为代表的人口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等标志着宏观人口经济理论的诞生。莱宾斯坦(H. Leibenstein, 1957)提出家庭规模决定的成本-收益理论,贝克尔(G. S. Becker)的《时间配置理论》(1964)、《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1976)和《家庭论》(1981)等奠定了微观人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宏观人口经济学和微观人口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人口经济学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日益成熟和完善。所以,人口经济学可以说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积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

在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起步较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要晚,但是发展很快。20世纪50年代后期,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1882—1982)发表了《新人口论》,主要从人口增长影响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新中国控制人口数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全面展开的,其标志性成果是张纯元主编、由全国10多所高校教师参编的《人口经济学》(1983),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阐述了人口经济的基本理论,指出人口经济学研究人口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经济关系,揭示人口经济关系的运动规律;“两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理论的基石,提出了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新概念、新框架。1987年,彭松建出版了《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阐述了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全书采取史论结合、以论为主的阐述方法,叙述了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经济

学说和当代人口经济学说,并把现代人口经济学分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进行介绍,在中国的人口经济学研究中口碑极佳,影响甚广。张文贤(1988)的《人口经济学》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以后的人力资源和劳动经济学有较大影响。此外还有一些相关成果,如《人口经济学》(古清中,1989)、《人口经济学导论》(万克德,1995)、《中国现阶段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人口经济理论研究》(李竞能,1998,2000)和《人口·经济·发展——人口经济学探索》(李通屏,1999)等。

21世纪以来,《人口经济学新论》(刘家强,2004)、《人口经济学》(李仲生,2006;2009;2013;李通屏,2008;2014;魏下海,2015)、《人口经济论》(杨坚白、胡伟略,2007)等相继出版。这些书籍虽然各有千秋,但总的来说,与现代经济学的迅猛发展和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转变相比,与我国人口经济的根本性转变相比,比较系统的人口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内容和相关理论研究,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变化总体显得迟钝、滞后。因此,跟踪现代经济学的动向,借鉴其理论、方法,建立与时俱进、涵盖人口与经济及相关领域主要问题的人口经济学,需要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

二、人口经济学的对象

(一) 人口经济学的对象——人口经济关系

人口经济学主要考察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研究人口变动的经济因素以及人口现象和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

美国人口经济学家 J. L. 西蒙认为,作为一门科学,人口经济学是一门地地道道的经济学学科。人口研究中最重要现象是人口规模的变化,而人口规模影响可供利用的资源。某一人群(及其后代)的食物、工业品、空间及其他资源是富裕还是贫乏,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他把分析人口规模 and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即人口增长对经济条件的影响、经济条件对生育率的影响和人口增长的经济决策作为其《人口增长经济学》的三大内容。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系 2005 年春开设的“人口经济学”课程强调,该门课程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人口问题(issues of population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尽管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但重点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行为(household behavior),侧重于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人口问题。主要内容包括生育决策、健康和营养问题、教育投资、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intra-household allocation of resource)、家庭结构和婚姻等。

日本人口学家南亮三郎指出,“人口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大渊宽认为,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多元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各变量内部也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

张纯元(1983)等出版的《人口经济学》认为,人口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的研究领域既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也不同于一般的人口学。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一般意义的人口,也不是一般意义的经济,而是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彭松建在《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中进一步指出,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经济关系,而人口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即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之间的关系。

总之,人口经济学的对象是人口经济关系,而人口经济关系是通过人口变量群与经济

变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多元的关系反映出来的。因此有必要对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做一些分析。人口变量群应该是反映人口状态及人口变动的量的集合,经济变量群则是反映经济及经济运行的量的集合。人口学把人口变动区分为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社会变动。反映人口状态的量,可从宏观的社会或微观的家庭(family)或住户(household)进行考察,前者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后者如家庭的规模、家庭结构等。反映人口变动的量如反映自然变动的出生(或出生率、生育率)、死亡(或死亡率),反映迁移变动的迁入、迁出,反映社会变动的人口社会构成的变动,如部门构成、行业、职业构成、文化教育水平构成等。经济变量群,宏观上如GDP、人均GDP、国民经济各部门(如农业、工业、服务业),宏观经济中的投资、消费、对外贸易、通货等,微观上如家庭范围内的收入、支出、家庭财产和家庭福利等,中观上如区域的经济状况以及反映经济运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运行的速度、经济质量、经济结构等。正是因为经济变量群与人口变量群包括的内容很多且极其复杂,所以人口经济学的细分就势所必然。^①

(二) 人口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主要特点

对人口经济关系特点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深化人口经济学的研究。

1. 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相互依存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

在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变量、经济变量以及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人口离不开经济,经济离不开人口。一方面,如果没有人类的经济活动,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没有自然资源以及用资源生产的经济物品,这些经济物品不经过交换、分配、消费,也就没有人类社会,人口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定限度的人口存在,社会经济活动也无从开展,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会经济过程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一定程度上说,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及其变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关系的演变过程。然而,人口与经济关系也是相对独立的。也就是说,人口经济关系不同于纯粹的人口关系或纯粹的经济关系。人口变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独特的领域,有其独立的运动过程和运动规律。正是这种特殊的矛盾,构成人口经济学研究的特定对象、特定领域。

2. 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交叉性和不可分割性

实际生活中,人口变量群不是只有人口因素,经济变量群也不是只有经济因素,相反,人口变量群中有经济因素,经济变量群中有人口因素。

3. 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相对长期性

人口经济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特别是一旦某种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相互依存关系形成并产生了后果,要改变这种关系及其后果,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时比较快,但相对于这一变化特点,人口经济关系的变化却比较缓慢。例如,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反映人口经济关系的人均指标则相对滞后。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达到世界第一,不难预期,而人均水平达到世界前列仍然

^① 有学者认为,人口经济学分为宏观人口经济学、中观人口经济学和微观人口经济学,而有学者建议,将人口经济学分为人口数量经济学、人口质量经济学和人口结构经济学进行研究。我们认为这种划分主要是由人口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

漫长。也就是说,人口变量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要发生较大变化,形成一种新的关系,需要长期的努力,短时间很难奏效。

4. 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广泛性

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涉及社会生活的面相当广泛。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有时表现得很直接,但大多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时期,表现为正向的关系,而随着人口经济关系作用条件的变化,这种关系也可能反转过来,比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可能表现出完全相反的情况,同一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与经济的依存关系也可能完全不同。在研究人口经济关系时,一定要注意人口经济变量联系的广泛性,既要看到直接联系的一面,也要注意间接影响的一面;既要看到某一人口现象的积极影响,也要考虑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

5. 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适应性

人口与经济之间有一个适应、协调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讲,任何事物之间的协调、适应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协调、不适应是绝对的、经常的。什么是人口与经济相适应?首先,这取决于人口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比较。不过这种比较的结果,一般情况下总是经济增长速度高出人口增长速度许多。如2019—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1%、2.2%和8.1%,人口增长率为3.32‰、1.45‰和0.34‰,经济增长率是人口增长率的十几倍、几十倍。这是否就说明我国的人口经济关系非常适应?当然不能。这还取决于我国社会经济整体状况和国民经济的循环情况及其内部结构。即使在人口零增长的情况下,经济仍然要保持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其次,人口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还取决于原有的基础和形成的水平。如在短缺经济下,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应略高于稳态增长率,才能保证人口与经济向协调、适应的方向发展。在需求比预期低,且过剩的供给不容易改变时,经济增长的速度低一些,而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一些,反而有利于消化长期积聚的生产能力,畅通经济循环。

三、人口经济学的性质

人口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这是不存争议的问题。但是人口经济学是属于经济科学、人口科学,还是属于经济科学和人口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形成的边缘学科,却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是人口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科学,而不是人口科学。属于人口科学的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经济人口学(economic demography)。所谓经济人口学,是指用经济分析方法来考察经济人口现象,主要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影响,经济变动对人口变动的影响。经济人口学可以用这样的公式表示:经济→人口→经济人口学。当代西方学者把古典经济学家对人口经济问题的分析看成经济学中的人口论,认为古典经济学家是从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人口经济问题的,最著名的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种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考察人口经济问题的传统,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所继承。如莱宾斯坦、贝克尔、伊斯特林等对家庭规模决策、生育率等问题的经济分析。到70年代,国际社会接受了“经济人口学”的名称。主张采用人口经济学名称的学者,提出的公式是:人口→经济→人口经济学。它主要是从人口出发考察人口对经济的作用,与此同时,也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影响(彭松建,1987)。人口经济学是经济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经济人口学是人口科学体系的

组成部分。^① 我们认为,人口经济学也好,经济人口学也罢,两者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多数著作并未进行严格区分。这是因为人口与经济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考察两者关系时很难考察一面而又忽视另一方面。将其归入人口学和经济学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边缘社会科学没有什么问题,但这样过于笼统,实际意义不大。因此,需进一步强调:

人口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经济学。经济学是人口学的故乡,更是人口经济学的故乡,马尔萨斯是最早研究人口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20世纪后半期,也有许多因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而闻名的经济学家。而且大量的人口经济学理论散见于经济学的著作之中。如孩子成本-效用理论在著名经济学家莱宾斯坦的《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中提出并进行了详细论证;刘易斯、托达罗、舒尔茨、贝克尔等因人口乡城结构、乡城迁移、人力资本和关于家庭决策的经济分析而跻身著名经济学家的行列。这些事实说明,把人口经济学或经济人口学归于经济科学没有问题。另外,人口经济学的理论还必须从其他部门经济学中挖掘、汲取,如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把人口经济学归结为经济科学,对该门学科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什么不好。

另一方面,经济科学是经世济用之学。人口经济学仅仅是这个显学中的一员,同其他经济学科相比,它的直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远不如金融、财会等经济学科来的直接、明显,特别是一些人口经济问题在经济高涨时又往往被掩盖、被忽略,因此,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不会像其他学科那样热闹。因为,人口经济学与人口学存在必然联系,而人口学真正派上用场和受到普遍重视起因于对“人口爆炸”的深切忧患,虽说有过较长历史,但长期以来始终“有气无力”。^② 对这个学科的关注需要社会责任感,需要淡泊名利的“牺牲”精神,人口经济学家是关注人口问题的经济学家,或者说是关注经济问题的人口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或者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人口问题,或者用人口学的理论、方法分析解释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人口经济学也被归于人口科学,^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认清我们有什么机会、需要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四、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每一项科学研究的集合,也是一组科学方法的集合。人口经济学涉及多种理论和方法,人口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它的方法至少包括三个层次:

(1) 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是由人口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也是人口

^① 苏联的一部分人口学家认为,“研究人口经济学要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人口经济学比经济人口学包括的问题范围要广泛,后者是人口学体系的一部分,研究人口再生产的经济方面”。参见瓦连捷伊主编的《人口学体系》,第三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② 出自法国人口学家索维,转引自邬沧萍为罗淳博士《从老龄化到高龄化——基于人口学视角的一项探索性研究》所写的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③ 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92),人口经济学是人口学的分支,学科代码为840.7115;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的分类,人口经济学也属于人口学,中图分类号是C92。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原来的人口经济学专业改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成为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人口经济学又回到了经济学的怀抱。

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2) 人口学的方法。如果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人口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所有人口研究的方法都适用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人口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有:统计调查分析法,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法,等等。

(3) 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方法论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最高和最抽象层次的方法论。它所讨论的是经济学的价值观、真理观、科学观。主要内容包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或经济世界观。人们通常所谓的经济学以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为基础,就是指经济学以上述哲学思潮或流派作为基本方法论。第二个层次的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学的思维原理和方法,或者说是经济学家观察经验事实、从事理论研究、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如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结构与制度、实证与规范、动态与静态、宏观与微观等研究方法。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学的技术性方法,即为了使经济学理论精确化、趋于完善而对特定研究对象或理论所采用的具有技术性的具体方法,^①如数学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系统分析和博弈分析方法等。经济学是人口经济学的故乡,许多著名的人口经济学家也多是经济学家,人口经济思想史的演进表明,不是经济学家的人口经济学家几乎是不存在的。没有经济学的悟性,就不可能对人口经济问题敏感。没有经济学家的理念和智慧,也就成不了著名的人口经济学家。要在人口经济领域有所作为,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口经济学家应具有经济学帝国主义^②的气度。

五、人口经济研究的资料来源

人口经济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这样几个渠道:经济学文献、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社会经济统计等。

(一) 经济学文献

人口经济理论分散于或存在于经济学的著作之中。如孩子的成本效用理论最初是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莱宾斯坦在《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来的;人口的乡城结构变化理论要从刘易斯等人有关二元结构的论述中进行挖掘整理;被称为西方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的舒尔茨、贝克尔等人的大量人口经济思想主要存在于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之中。研究人口经济学还必须从其他部门经济学中挖掘、汲取,如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

(二) 人口普查

人口普查(census)是反映国情国力的重要调查,是当今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搜集人口资料的最基本的科学方法,是提供全国基本人口数据的主要来源。按照联合国在《人口与

^① 许卓云.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比较. 学术研究[J]. 2006(5).

^② 参见 Edward P. Lazear, Economic imperial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Vol 115, 99~146; 张五常、樊纲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一书所写的序一、序二,朝华出版社,2005; 李通屏等. 经济学帝国主义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年第5期.

住房普查的原则与建议》一书中的定义,“人口普查是收集、汇总、评估、分析、发表和分发一个国家或国内一个地区所有人口在某一段特定时间内的人口、经济和社会数据的全部过程”。可以看出,人口普查是包括了一系列工作的很长的过程。在普查的登记工作开始以前有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登记工作完成以后还有手工(快速)汇总、事后质量抽查,然后要对数据进行评估,从事计算机汇总、发表与数据的分析和应用等工作。

从人口普查的本质看,人口普查就是“一个国家在统一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统一的方法、统一的项目、统一的普查表格和统一的标准时间,对全国人口普遍地、逐户逐人进行的一次性调查登记的过程”。它是依据有关法规、由政府出面组织、社会全体成员参与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包括人口数量、素质、结构方面的项目,而且涉及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多种指标,是一次全方位的国情、国力调查。亦称“国情普查”或“国事调查”。人口普查所提供的数据都是一些基础性的人口数据,因此也是很重要的数据。人口普查数据除了为政府的施政、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以外,更是研究人口结构、人口分布、过去和未来人口增长不可缺少的资料。城乡人口集散的型态、城市化的发展、随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某些人口地理分布和型态、人口年龄和性别的演变、不同人口群体的出生和死亡的差异、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增长和分布与劳动力增长和分布的关系等,都是人口研究的主要课题。人口普查的数据是做这些研究的主要数据。国际上公认的现代人口普查是1790年从美国开始的,迄今全世界已有200多个国家进行过2000多次人口普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进行过7次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登记项目由“一普”的6项增加到“五普”的49项,“六普”特别增加了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人口经济活动、流动人口、住房、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内容,从而将人口数据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人口普查工作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组织实施。由于普遍进行、同一时间、同一表格和程序以及组织的官方性和定期性(见专栏0-1),人口普查保证了数据的全面性和权威性,因而是进行人口经济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

专栏 0-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基本情况

根据《统计法》和《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我国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开展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主要目的是全面查清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情况,为完善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统计信息支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七人普”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人口普查现场登记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成立“七人普”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全体会议和电视电话会议,研究部署普查有关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地方各级政府精心组织实施、通力协作配合,全国省、市、县、乡、村级共组建67.9万个普查机构,选聘700多万名普查人员,对全国所有家庭和人口进行了全面普查,圆满完成普查入户登记任务。

“七人普”全面采用电子化数据采集方式,实时直接上报数据,首次实现普查对象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自主填报,强化部门行政记录和电力、手机等大数据应用,提高了普查工作质量和效率。“七人普”坚持依法进行,认真落实普查方案的各项要求,实行严格的质量

控制制度,建立健全普查数据追溯和问责机制,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数据单独统计)中随机抽取141个县的3.2万户进行了事后质量抽查,结果显示,“七人普”漏登率为0.05%,普查过程严谨规范,结果真实可靠。

资料来源:宁吉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情况》,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05/t20210511_1817195.html。

(三) 抽样调查

抽样调查是根据部分实际调查结果来推断总体标志总量的一种统计调查方法,属于非全面调查的范畴。它是按照科学的原理和计算,从若干单位组成的事物总体中,抽取部分样本单位来进行调查、观察,用所得到的调查标志的数据代表总体,推断总体。我国在1987年、1995年、2005年和2015年有过4次1%人口抽样调查。

(四) 社会经济统计

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口变量群和经济变量群的关系,其中的经济变量群又由许多社会经济指标组成,因此,根据研究的目的和需要,广泛利用政府组织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发布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对开展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非常必要。在我国,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济普查、农业普查、工业普查和第三产业普查、基本单位普查等方面的资料;一些机构或组织进行的专题调查和跟踪调查资料,如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和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等。在人口经济研究的国际比较中,联合国(UN)及其相关部门、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劳工组织(IL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库、专题报告和年度报告等。



主要概念

人口经济关系 人口变量群 经济变量群 经济学帝国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 人口普查



思考题

1. 试述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主要特征。
2. 简述人口经济学有哪些基本的研究方法。
3. 试比较不同版本人口经济学的主要特点与异同。
4. 试述人口经济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参考读物



上 篇

人口与经济的一般理论

第一章

人口与经济的古典理论与新古典理论

第一节 古典经济学家的人口经济理论

“古典经济学”有时用来特指经济思想史上自 1750 年至 1870 年这个阶段,在这期间,一批来自英国的经济学家,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出发点,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分配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而广义的古典经济学定义还需包括古诺(Cournot)、迪皮特(Duputt)、屠能(Thunen)、格森(Gossen)这些当时欧洲的经济学家,当然还有一些起先看似背离亚当·斯密传统理论的英国学者。因此,古典经济学不仅指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而且涉及对经济问题的特定态度(马克·布劳,1991)。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始于 17 世纪的威廉·配第,结束于大卫·李嘉图;凯恩斯则认为,古典学派的起止点是从李嘉图到底古(Pigou)。对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独占鳌头的伊格利(R. Eagly,1974)认为,古典经济理论的时间跨度从 18 世纪 50 年代的重农学派开始,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①根据马克思的划分和中国绝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同时结合本章的结构安排,这里的古典经济学是指 17 世纪中叶至 19 世纪上半叶流行于西欧各国,代表产业资本和产业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一种经济理论。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威廉·配第为代表的产生阶段、以亚当·斯密和法国魁奈重农学派为代表的发展阶段以及以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完成阶段。

一、威廉·配第的人口经济思想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出生于英国汉普郡伦姆塞一个毛纺织业手工作坊主家庭,马克思称他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配第一生的著述有 34 部,其中的主要著作有:《赋税论》(*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1662)、《献给英明人士》(*Verbum Sapienti*,1665)、《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1676)、《爱尔兰政治解剖》

^① 参见“古典经济学”,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473-483.

(*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1672)和《货币论》(*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 1682)等。在这些著述中,很多地方涉及人口经济问题。

(一) 人口多则财富也多,而人口少是真正的贫穷

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论证了人口与财富关系的思想,强调人口从而劳动力人口增长对增加社会财富的积极意义。他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①的名言。他认为,人口多则财富也多,而“人口少是真正的贫穷。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要比面积相同而只有四百万人口的国家不仅富裕一倍”,因此主张增加人口。他还认为:国家要想增加财富和收入,一方面要尽量减少非生产人口和非生产支出,使财产从占有土地而游手好闲的人手里转移到聪明而勤勉的人手里;另一方面应当强迫贫民劳动,尽量扩大劳动人数。他认为,一定速度的人口增长可以使人均社会管理费用的水平有所下降。因为,“行政官吏是需要很多经费来维持的,可是,同一人数的行政官吏,管辖人口多与管辖人口少一样,差不多能同样地执行任务”^②。

(二) 社会经济与人口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方面,配第论述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迁移变动的作用。在涉及荷兰与英、法之间人口迁移(当时荷兰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时指出:“荷兰人不肯从事两种职业……第一种职业就是当普通士兵,由于这些士兵能够从英格兰和法国雇到,他们就让这些士兵去冒生命危险,代价是每天六便士。”^③接着,他对当时从英、法等国向荷兰的人口迁移以及移民就业等问题展开论述。他说:“由于雇用外国人当兵,荷兰的人口因而日益增多起来。由于这些外国人的儿女同时也是荷兰人,他们能够各就所业;同时荷兰人又准许新来的外国人无限制地入境。另外,这些士兵还利用空余时间做一些工作,其收入至少不低于自己的消费需要。”^④可见,配第既关心经济相对发达国家吸引境外人口迁入的事实,也注意到了移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配第也谈到了人口发展状况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他曾担心一国因人口少而不利于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人口少得使人们只须靠天然的产物,或只须作轻微劳动(像从事畜牧业之类的作业)就能维持生活,那么,他们就会变得没有任何技能。”^⑤配第还认为,人口数量太少,在商品经济中对货币数量的需求有重大影响。除了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次数(或频率)和最小币值两个因素之外,国内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需求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口规模的大小。“商业上所需要的铜币的数目,要由人口数目及它们的交换次数来决定……”^⑥这一认识,早已引起近现代货币银行家的关注,并纳入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倪跃峰,1995)。

(三) 人口价值论

配第首次严肃地运用了人力资本的概念(S. Rosen, 1991)。1676年,他把作战中军队、

① 威廉·配第. 赋税论[M]//威廉·配第. 配第经济著作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66.

② 同上: 32-33.

③ 威廉·配第. 政治算术[M]//威廉·配第. 配第经济著作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32.

④ 威廉·配第. 赋税论[M]//威廉·配第. 配第经济著作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18.

⑤ 同上: 32-34.

⑥ 同上: 103.

武器和军械的损失与人类生命的损失进行了比较。这种比较的一些原理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他十分重视人口的劳动技能,认为一个国家人口的价值,不在这个国家所拥有的人口自然数量,而在于它的社会数量。“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许多工作。例如,一个人用磨粉机把谷物磨成粉,他所能磨出的分量会等于二十个人用石臼所能舂碎的分量。一个印刷工人所能印出的册数,会等于一百个人用手抄写出来的册数。”^①配第认为,“土地耕种者、海员、士兵、手工业者和商人,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真正支柱”“英国的土地耕种者每周劳动所得不过四先令,而海员通过工资、食品以及房屋等其他各种供应所得到的收益多到十二先令,所以,一个海员实际上等于三个农民”。^②在《献给英明人士》中列举了一系列的数字,把人口和人口创造的价值进行了量化。他写道:“如果六百万人口值四亿一千七百万镑,那么,每个人就值六十九镑;而其中三百万劳动者每人值一百三十八镑,按每日大约十二便士计算,这等于七年的年收入。”^③

二、魁奈的人口经济学说

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是法国重农学派(Physiocrat)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同时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出生于巴黎一个律师家庭,早年专攻医学,获博士学位,后成为法国王宫的宫廷侍医。当时法国国内经济十分不景气,经济问题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魁奈从而转向经济学。其主要著作有:《农场主论》《谷物论》《人口论》和《经济表》等。在《人口论》中,他分析了法国的人口经济问题,探讨了人口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他说,“国家的实力在于人:财富因人的消费而增长;他们需要的产品增加得越多,消费越多,他们就越富有”。“国家财富的保存和增加以及不断恢复和更新,要取决于对人劳动的利用和人口的增长”^④。他的《人口论》包括人口状况,人口缩减和增长的原因,认为人口增长完全取决于财富增长,取决于劳动、人力和这些财富本身的使用方式三部分。

(一) 一国人口随着它的收入增长而增加

因为收入能够提供吸引人并能留住人的富裕生活和利益;但是,只有对人的劳动的使用同国家的自然优越条件相适应,国家才能增加收入。在这里,他指出了人及其劳动与自然条件相适应是财富增加的条件,使人口经济理论较前人更进了一步。

(二) 人口缩减和增长的原因

魁奈认为,“战争、不结婚、食品低劣、缺乏耕作土地的资金和下层人民生活贫困等,都会妨碍人口增长。”他强调政府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对外贸易来保证销售自己生产的粮食商品。只有能销售出去,而且价格能补偿费用并保证得到收入,国家才会努力使农产品丰富。收入如能补偿人们的劳动并保证他们的利润,给予他们富裕的生活,就能把人口吸引到这个国家。即优价销售创造收入,收入又会引起人口增长。他论述了农产品价格、对外贸易、

① 威廉·配第. 政治算术·原序[M]//王亚南主编.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65.

② 同上: 67-77.

③ 威廉·配第. 献给英明人士[M]//王亚南主编.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57.

④ 弗朗索瓦·魁奈. 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85.

人口和财富增长的关系。他说：“产品通过对外贸易所能达到的价格越高，就越有利于国家、所有者和人民，国家的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就越大……从增加人口的观点来说这是重要的，因为丰裕的谷物吸引人，而且有利于人口的自然增长。”^①没有农产品的双边贸易，这个国家就不会有稳定的销售价格；如果轻视自己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就会对自己的财富、人口增长和实力造成巨大的损害。人口增长完全取决于财富增长，取决于劳动、人力和这些财富本身的使用方式。

（三）人口和财富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魁奈对人口和财富保持一定比例关系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②他说，人们能够在某处获得财富，过上富裕生活，并能作为所有者平静地拥有靠自己的劳动和才干所创造的一切，他们就会在那里聚集和生活。收入增长的国家，以其可能的报酬吸引着新居民，因而财富的增长伴随着人口增长。只有在财富的作用下，才能使人口繁衍和财富增长。人口促进财富增长是有条件的：“当国家在人口和产品方面都达到高度繁荣时，人们以其财富给国家带来的益处比以其数量带来的益处要大……但是，如果人口与从土地和对外贸易中取得的财富数量相比显得过多，那么，过多的人口就不能促进财富增长……如果人口太多，那么人们的消费就会减少到最迫切的必需品，结果国家就会由繁荣变成贫穷。”^③因此，人口和财富之间有一个比例。如果这一“比例遭到破坏，人口相对过多，那么，这种过多的人口将使国家大为贫穷。工资将同人口成比例地下降，消费也与工资成比例地下降，使人们贫穷得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土地所有者收入减少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缩减自己的花费，从而使各种从业者的工资下降，最后则是人口的减少”。^④

三、亚当·斯密的人口经济思想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英国的苏格兰，先后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斯密一生曾写过十几种社会科学的著作，但生前出版的只有《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两部著作。他的经济学是以经济自由为中心，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他的人口经济学说以工资理论和人口理论的结合为特征。他的人口经济思想如下：

（一）从一般商品的社会需要决定该商品的社会生产这一观点出发，提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决定人口生产的思想

“如果劳动的需求继续增加，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使他们能够不断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需求……像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生产过于迟缓，则加以促进；生产过于迅速，则

① 弗朗索瓦·魁奈. 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05,85.

② 《人口论》用一半的篇幅论证这个问题，同上：107-139.

③ 同上：135-137.

④ 弗朗索瓦·魁奈. 魁奈《经济表》及著作选[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37.

加以抑制。世界各地,不论在北美,在欧洲,或是在中国,支配和决定人口繁殖程度的正是这一需求。”^①

(二) 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斯密继承了配第劳动是财富的源泉的观点,赞成人口增殖;同时也接受财富增长先于人口增长的观点。认为财富增长会提高劳动报酬,从而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使人口增殖。斯密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手段是分工;二是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这两种途径都和人口有密切关系。从财富的创造方面,他把总人口划分为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前者同他们推动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人口增加,从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增加,进而国家财富增加。他也注意到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人的增殖和动物一样,“自然和其生活资料成比例”“自然会和其生活资料相称”。^② 在分析人口与消费的关系时指出,消费性财富同总人口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一个国家消费水平的高低,依存于这一关系。他主张消费节俭,以便为经济发展积累资本。消费是人口生产的必要条件,消费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要增加资本,要增加资本就有必要增加人口,让更多劳动者生产更多的财富。斯密还分析了贫困与富裕对人口生产影响的差别。奢侈的妇女追求享乐,从而会削弱生育力。而贫困在没有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之前,贫困妇女的生育率要比富裕的、奢侈的育龄妇女高得多。贫困似乎有利于生育,但不利于抚养子女(杨云彦,1999)。

(三) 首次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劳动技能对个人收入和工资结构的影响,把工人技能的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基本源泉

他说:“劳动工资,因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而不同……一种费去许多功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的机器。”在《论资财的划分》一章中,他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总资财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留供目前消费的,其特性是不提供收入或利润;第二部分是固定资本,其特性是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第三部分是流动资本,其特性是要靠流通、靠经常更换主人而提供收入。其中,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是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

“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它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兼取利润。”^③

①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3—74.

② 同上: 73、139.

③ 同上: 93、256-258.

四、大卫·李嘉图的人口经济思想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1823)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和完成者,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犹太族家庭,受过两年商业教育,后从事商业交易活动。25岁时成为巨富,转而研究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

李嘉图继承了斯密关于对人口的需求支配人口生产的思想。认为人口增减受劳动市场需求的调节。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当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其自然价格时,劳动者的境况是繁荣而幸福的,能够得到更多必需品和享受品,从而可以供养健康而人丁兴旺的家庭。但当高额工资刺激人口增加,使劳动者人数增加时,工资又会降到其自然价格上去,有时还会由于一种反作用降到这一价格以下。”^①劳动人口随工资涨落而发生变化,从而使对人口的增减与对劳动的需求相适应。劳动需求是人口增长的动因。他认为,先有对劳动需求的增加,才导致人口的增加,才创造了对食物的需求和对其他生活资料的需求。李嘉图主张“道德抑制”。通过在劳动自然价格与绝对的最低生活水平之间设立“避难所”,使工人的生活状况在人口激增、劳动的市场价格(工资)下降到自然价格以下时,也不可能变得十分悲惨,否则人口会绝对减少。为了缓解贫困,避免无准备的早婚,国家应奖励国民的道德抑制,不必采取国家济贫法这种不高明的对策。

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出发,李嘉图认为土地的生产力和资本积累率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率,因而导致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他说:“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生产力虽然可能仍大于人口的繁殖力,但这种情形不会长期继续下去。因为土地的数量有限,质量也各不相同,土地上所使用的资本每增加一份,生产率都会下降,而人口增殖力却是始终不变的。”怎么办?“仅有的补救办法不是减少人口,而是更迅速地积累资本。”^②李嘉图还论述过机器使用的后果。他认为“机器代替人类劳动,对于劳动者阶级往往是极为有害的”,因为机器的使用虽然增加了国家财富,但是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马克思曾经指出:“李嘉图的伟大功绩之一,是把机器不仅看作生产商品的手段,而且看作生产过剩人口的手段。”^③

第二节 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

一、产生背景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出生于英国萨利州一个土地贵族家庭。早年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历史、哲学和神学。1798年加入教会,成为一名牧师,后来成为东印度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因《人口论》《政治经济学原

① 大卫·李嘉图. 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78.

② 同上: 82-83.

③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447.

理》(1820)而闻名。

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英国经历着产业革命和社会经济的急剧变革,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英法战争等一系列事件对经济思想和现实都有很大影响。产业革命引起了机器大工业对工场手工业的替代,英国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代替商业资本,产业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而大批工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因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社会变革陷于贫困、破产境地,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激烈批判,主张社会改革。当时在英国影响比较大的是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的《政治正义论》和法国人孔多赛(Condorcet,1743—1794)的《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观察》(1794)。他们认为社会弊病的根源是私有制,只要实现财产平等制度,人类理性的进步会使人们获得幸福。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他的人口理论的目的在于预测人类未来的情况,创立一种科学根据,以反对空想的著作家们。《人口论》初版于1798年,马尔萨斯生前又5次再版(1803,1806,1807,1817,1826)。他死后的38年,即1872年出版了第七版^①。及至1985年联合国巴黎人口会议上,与会者以99.8%的压倒多数票赞成再版(何清涟,1988)。

二、主要内容

马尔萨斯自称受亚当·斯密的影响最深,他把斯密有关人口受生活资料制约的论点加以修改,结合华莱士等人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人口经济理论。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 两个公理

马尔萨斯全部人口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是两个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②这是马尔萨斯针对葛德文关于两性间的情欲受理性支配且逐渐减弱的观点提出来的。他还认为,食物和情欲是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是超社会的自然存在,是由人类本性决定的。

(二) 两个级数

从两个公理出发,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两个级数的假说。他说:“我的公理一经确定,我就假定,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这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他提出的两个级数是,“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数率增加。”^③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可用表1-1说明。

表 1-1 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

期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年数	1	25	50	75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人口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生活资料	1	2	3	4	5	6	7	8	9	10

①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03,313.

②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4.

③ 同上:5,43.

从表 1-1 可以看出,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起初差距不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差距日益增大。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是不平衡的,人口如不受限制,25 年后会增加 1 倍,在两个世纪中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例变为 256 : 9,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之所以如此,他认为这是“一切生物的增殖有不断超过对它提供的营养的倾向”。《人口论》再版时,他又以土地肥力递减律进行论证,继而断言人口增长有一种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自然趋势。

(三) 三个命题

根据两个公理和两个级数,他推论出三个命题:①人口增加,必须受生活资料的限制;②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增加;③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为贫穷及罪恶所抑压,致使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的不平衡是自然的,这两种自然力作用的结果必须使它们保持平衡,而达到平衡的途径是生活困难,因为贫困、罪恶压抑着人口增长。他把这一切看作是自然法则的要求。日本人口学家南亮三郎等把上述三个命题分别概括为“制约原理”“增殖原理”和“均衡原理”。并且认为马尔萨斯的意图是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一旦达到平衡,又会为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所破坏,然后又向新的平衡发展。马尔萨斯把三个原理结合起来称为“人口原理”。

(四) 两种抑制

马尔萨斯认为,一切社会改革都无助于人口问题的解决。那么,如何保持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呢?他认为通过死亡率和出生率这两种机制的变化可以实现,死亡率随生活水平下降而上升,这是积极抑制;出生率随生活水平下降而下降,这是预防性抑制。^①他对两种抑制的观点做了进一步解释。所谓“积极抑制”,是指通过贫困、饥饿、瘟疫、灾荒、战争等手段去妨碍人口的增加。马尔萨斯为积极抑制设想了两种行动方式。一种是与工资下降相联系的不断增加的“灾难和罪恶”,它包含了会减低生育率和提高死亡率的一些关系。另一种是突发的死亡率危机使人口在一二年内大为减少。所谓“预防性抑制”,指通过禁欲(不结婚)、晚婚、不生育等预防人口增加,这又称为道德抑制。“道德抑制”是出于远虑的动机克制着不结婚,而在这种克制的时期里又保持着严格的道德行为的那种节制。他要求那些在现实世界“无希望”摆脱贫困的人寄“希望于来世”。他要求穷人甘愿穷苦而不结婚、不生育子女,以便到上帝那里和来世去追求幸福。

(五) 结论——马尔萨斯均衡

根据上述分析,马尔萨斯得出了四个结论:

1. “人口法则”是永恒的绝对法则,适用于一切社会

马尔萨斯说:“人口继续和土地所产食物保持正常比例的命题,很可以说是个无可辩驳的命题”。

2. “人口法则”的作用造成失业、贫困甚至罪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实行“济贫法”是错误的

马尔萨斯说:“在人类的场合,是贫穷与罪恶。前者,贫穷,是这个法则的绝对必然的

^① 见 D. R. Weir 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3 卷)所写的词条 Malthus's Theory of Population, 313。

结果。罪恶是可能的结果。”“济贫法”不但使处于贫困的工人得以存活下来，它的明显错误是鼓励结婚，从而使人口继续增加，“供养贫民以创造贫民”，“当前救贫法制度就应缩减或停止增加救济，在我看来，我们必须以正义与荣誉来正式否认贫者有供养的权利。”^①

3. “人口法则”的作用把工人工资压低到最低水平

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马尔萨斯提出了“维持劳动基金论”，认为工资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劳动力供求状况。在劳动力市场上，人口增加，工人的供给会超过就业机会，则工资下降，甚至压到最低水平。尽管工资下降，但由于“人口法则”的作用，人口仍在不断增加，进而引起食物需求增加和物价的上涨，工人生活贫困。生活贫困迫使工人晚婚或不结婚，从而使工人人口缩减，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于平衡，从而使人口与生活资料趋于平衡，然而工人所得工资仍不可能有多少变化。这种情况即马尔萨斯均衡模型(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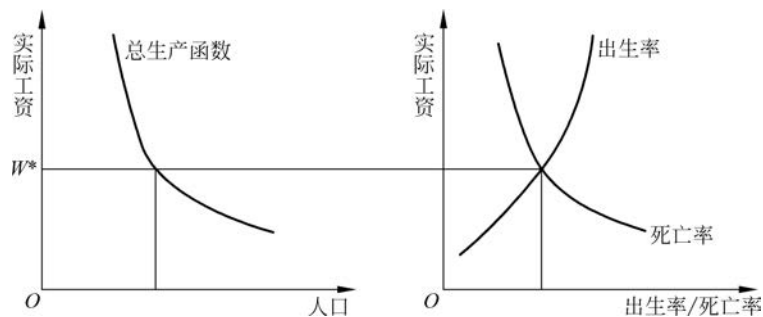


图 1-1 马尔萨斯均衡

在图 1-1 中，三条曲线分别表示三种函数关系。左半部是总生产函数，表示由一定数量的人口所形成的生活水平(或实际工资，或人均收入)。它的基本特征是劳动报酬递减——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信条，不是马尔萨斯所独有。右边表示人口现象。死亡率随生活水平下降而上升，这是积极的抑制。出生率随生活水平下降而下降，这是预防性抑制。出生超过死亡，人口增加；死亡超过出生，人口减少。人口增长(通过生产函数)使生活水平下降，生活水平下降使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最终使人口增长趋于中止。在此简单的模型中，人口增长为零即为均衡状态。在此均衡点上，工资不变(图中的 W^*)，因而死亡率和出生率也不变。因为任何干扰只会引起补偿性变化，所以这种均衡是稳定的。该均衡的稳定性是马尔萨斯悲观主义的来源。设想土地耕作面积扩大了，于是生产函数将向外移动，提高了现有人口的生活水平。由此，出生率将上升，死亡率下降；人口增长将继续吞噬增益，直到工资降到原先水平为止。人口现象是工资铁律的铸造厂。图中的 W^* 曲线，表示的是生活水平(或实际工资，或人均收入)长期的变化趋势。人口增长往往会突破均衡。通过诸如大饥荒或疾病一类的灾祸起作用的积极抑制一般不会轻易反应，但一旦反应，便会矫枉过正，引起新一轮循环。马尔萨斯预见到围绕着一种长期均衡水平的波动(D. R. Weir, 1991)。

4. “人口法则”使任何试图通过实现财产平等来消除失业、贫困的社会改革趋于失败

马尔萨斯认为，一切人不可能平等享受自然的恩惠。所以，“任何幻想的平等，任何大

^① 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规模的农业条例,也不能除去这个法则的压力,甚至要把它除去,仅仅一个世纪亦不能够。要社会全体人的生活都安逸、幸福而且比较闲暇,不必悬念自身及家族生活资料如何供给,那是无论如何亦不可能的。”^①他认为,葛德文设想的公平社会,甚至30年不到,就会有一个单纯的人口原理,全行破坏。葛德文最大的谬误,就是将文明社会的一切罪恶与贫穷,“概归过于人类制度”,而忽视人口法则的决定作用。财产私有制、社会不平等是合理的、永久的,人口法则使人和社会改革徒劳。

三、简评

马尔萨斯人口经济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著作,不管是指南还是靶子,毕竟已经成为现代人口理论的开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诞生有着极大启发。马尔萨斯在生前和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都受到推崇,成为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刘玉波,郑晓红,1998)。凯恩斯称他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鲍泰罗(G. Botero, 1540—1607)第一个谈起悲观的调子,而到了马尔萨斯时代就成了如此有名的争论中心。他把人口增加和实际的或潜在的悲惨不幸联系在一起,但是大部分相信人口倾向于无止境增长的作者,并不同意鲍泰罗的观点,反而同意他们那个时代和国家的人口主义观点。^②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影响曾做出这样的评价:“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③马尔萨斯所阐述的人口经济思想,200多年来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马尔萨斯的名字已经成为人类思想和全世界共享的财富之一。这是因为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有其合理内核。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讲,其学术价值有:从消费领域为研究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开辟了蹊径,是正式研究人口经济关系的第一人;关于人口法则和社会制度改革关系的论述对研究人口与制度的关系提供了思路;关于人口运动自然规律的分析对今天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有重要意义。

必须指出,马尔萨斯人口经济理论存在明显问题和缺陷,马克思对其庸俗性、非科学性和辩护性进行了极为严厉的痛斥。他的出发点在于批判葛德文等人的至善论,说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恒性;他理论中的命题不是他的独立思考,他的论断来自前人的成果(马克思称其为剽窃);否认人口规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把人口规律和人口法则看成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永恒规律”;他的结论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因而十分错误和荒谬。韦尔(D. R. Weir)认为,马尔萨斯理论的最大失败是解释婚姻出生率从几乎失控的高比率到现代低比率的转变。在任何情况下,长期出生率的下降趋势都不是由国民收入下降趋势引起的。但总的说来,各种人口理论都应感谢马尔萨斯,并且必须向前发展。

① 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② 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1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396-400.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620-621.

第三节 马歇尔的人口经济思想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1885—1908年,他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期间,创立了剑桥经济学院,该学院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声名鹊起;A. C. 庇古和J. M. 凯恩斯都曾是他的学生。他的巨著《经济学原理》,在他去世前8次再版,多年来一直被奉为英国经济学的“圣经”,它引入了很多至今仍为人熟悉的概念。马歇尔的人口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济学原理》一书,特别在该书的第四篇较集中地探讨了人口经济问题。

一、人类是生产、消费以及与之有关的分配和交换问题的中心

马歇尔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资源,是从陆地、海洋、空气、光和热各方面获取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假如把劳动解释为劳动者——也就是人类的意思,那么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个词就比较对称了。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作一部分收入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资本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有时要把组织算作一个单独的生产要素。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要素只有两个,即自然与人类。资本与组织是人类在大自然的帮助下,在人类预测将来的能力以及甘愿为将来做准备的心理指导下进行工作的结果。但人类本身是由环境塑造形成的,而在环境中,大自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因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人类都是生产问题的中心,也是消费问题的中心,进而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分配与交换问题的中心。

二、经济学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对人类一般生活的研究,是对个人与社会活动中获得和使用保证生活安康物质必需品的最密切相关部分的研究。因此,一方面经济学研究财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研究。这是因为人的性格形成于日常工作及由此获得物质资源的过程之中。人类在数目上、在健康强壮上、在知识和能力上以及在性格多样化上的发展,是我们一切研究的目的。但对于这个目的经济学的贡献是有限的,我们还必须考虑人类在生产上的直接作用以及决定人类(作为生产者)效率的各种条件,因此,最方便的办法是把人类在数目和性格上发展的一些说明,包括在有关生产的一般性并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三、关于人口增长的经济思想

(一) 人口增长、公路和铁道等交通便利设施是构成地租的最重要因素

马歇尔指出,在一个古老的国家里,田地的全部地租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第一是大

自然创造的土壤的价值；第二是人类做出的改良；第三——这往往是最重要的因素——是稠密的大量的人口增长、公路和铁道等交通便利设施。因为人口压力增大，贫瘠土地的价值通常比肥沃土地相对来说有所增大，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会使贫瘠地超过肥沃地的价值。一度完全为人所忽视的土地，由于投入了很多劳动，就可长出多产的作物。一个新的国家中最初的移民必然选择最肥沃的土地，而随着人口增加，逐渐地，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都得到了耕种。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人口增长势必将造成生活资料压力的增加。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阻碍，人口增长最终会因为难以获得农产品而受到阻碍。虽然报酬递减规律发挥作用，但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在很长时期内仍可能受制于新的供给范围，铁路、轮船交通的低廉以及组织和知识的进步。

（二）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

马歇尔认为，在动植物界，动植物的繁殖一方面受个体繁殖自身种类倾向的支配，另一方面又受生存竞争的支配。只有在人类中，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冲突会因其他影响而变得复杂：一方面，对将来的顾虑使许多人控制他们的自然冲动。另一方面，社会以宗教、道德和法律制裁对个人施加压力，以达到时而加速、时而阻碍人口增长的目的。他说，世界各国历代所有有思想的人都早已注意到形式多少有点模糊的人口研究。在强盛的民族中，在重大的军事冲突时期，他们力求增加能使用武器的男子的供给；在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他们谆谆教导人们要尊重人类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而在低级的发展阶段，他们又鼓励甚至强行残酷屠杀老人、弱者，有时甚至是杀一部分女婴。基于人口学说史的回顾，他考察了结婚率和人口出生率。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首先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增加，其次取决于移民。而人口出生数主要取决于有关结婚的习惯，结婚年龄不仅随着气候而不同，而且对于生活状况不同的人也有所不同。平均结婚年龄在中产阶级中最高，在技术工人中次之，而在没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当中最低。如果不是穷到无以为生，并且不受外部原因的抑制，无特殊技能的劳动者具有在30年内增加1倍的能力：这就是在600年中增加100万倍，1200年中增加1万亿倍。就人口迅速增长的条件而言，新国家农业区域的条件更有利。美国的“农民”和家人过着健康的户外生活，没有什么会遏制人口的增长，反而一切都会刺激人口增长。外来移民有助于人口增长。美国的人口在近百年中已增加了16倍。^① 人口出生率在富裕人群中更低，而在那些为自己和家庭的将来不作打算并且过着忙碌生活的人当中更高。

（三）如果人口增加，共同效率一般就会随之有超比例的提高

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口拥挤的城市中的人们往往会养成不健康并且消耗人精力的生活习惯。有时，人口增长一开头就很不好，超过了人们的物质资源，使人们用不完善的工具过度地向大地索求，引起报酬递减律在农产品方面的强烈作用，却没有能力把此规律的结果缩小到最低限度。如果一开头就出现贫困现象，那么人口增长就会继续对人们性格上的弱点产生极为常见的后果，从而不适宜一个民族发展和工业组织的完善。

上述这些是人口增长的严重危险。但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和精力的民族，其共同效

^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52-161.

率的增加在比例上可以超过人口增加。如果此民族能暂时避免报酬递减律的压力；如果此民族的财富没有消耗于重大的战争之中，而财富的增长速度至少与人口增长相同；如果此民族避免使其身体衰弱的生活习惯，那么人口每有增加，就会使其民族获得物质产品的力量暂时有超比例的增长。人口增长使他们能获得专门技能和专门机械，也能获得区域大规模工业生产所带来的许多好处。人们相距很近，因而与交易有关的各种成本下降，而且使他们有机会获得各种社会享乐和文化生活方面的舒适品和奢侈品。人口增长和与此相适应的物质享乐产品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就会使由享乐产品所产生的总收入有超比例的增加。基于文明国家财富积累比人口增长更快的现实，他说：“如果人口增长不那么快，那么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就会增长得快一点，这也许是对的。但实际上，如果人口有所增长，随之就会出现对生产的巨大的促进作用：现在英国，因为容易得到大量原料供应，除了对阳光、新鲜空气等的需要外，就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有超比例的增加。然而这种增加的大部分不归功于工业效率的提高，而是归功于伴随着人口增长而带来的财富的增加。”^①

第四节 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经济适度人口的概念由来已久，马尔萨斯《人口论》已有所涉及，但最先系统提出经济适度人口观点的西方学者是英国经济学家 E. 坎南(Edwin Canna, 1861—1935)和瑞典经济学家 J. G. K. 维克塞尔(J. G. K. Wicksell, 1851—1926)。此外，卡尔·桑德斯(A. M. Carr-Saunders, 1886—1957)，H. 道尔顿(H. Dalton, 1887—1962)等人也都对早期适度人口理论的创立与发展做过贡献(李竞能, 1992, 2004)。对经济适度人口的研究又可分为早期经济适度人口学说和现代经济适度人口学说两个阶段。

一、早期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坎南作为早期经济适度人口的代表人物，他在 1888 年出版的《初级政治经济学》中指出：“在任何一定时期，存在于一定土地之上，能够获得产业的最大生产力的人口数量是一定的。”这个一定数量的人口实际上就是经济适度人口。其后，在《财富论》(1914, 1920)中，他明确提出，平均生产能力最大点的人口就是报酬最大点的人口，即经济适度人口。这个适度人口的位置将随知识进步和其他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因此，适度人口应当从长期的和一个较大范围的人口运动中去把握和考察。他对适度人口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报酬递减规律”的应用，并把相应分析扩展到所有产业。坎南指出：“在任何一定时期，知识和环境保持不变，刚好每一种产业有一个最大收益点。所以把所有产业加在一起，也一定有一个最大收益点。如果人口规模没有达到足以使所有产业达到最大收益点，收益将会少于应有水平；另一方面，如果人口规模如此之大，以致超过了所有产业受益最大点所要求

^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265.

的人口,那么,收益也会低于应有水平。”在此,他实质上提出了静态“经济适度人口”的概念。

维克塞尔首先把边际分析引进适度人口理论研究。他声称:“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仅仅争论最大限度人口。然而,在理论和实践上更为重要的是要探讨最有利的或适度的人口密度,而不是最大限度的人口密度。”他给人口的“适度”下的定义是:“人口达到其数量稍许增加就会导致繁荣不再增加,而是减少的那一点。”他还进一步探讨了如何通过调整人口内在要素(出生率和死亡率)来达到适度人口规模,认为适度人口规模的实现是人口增长的两种效应相互抵消的结果:一种是人口增长时,减少人均土地和自然资源水平的反效应;另一种是促进协作和劳动分工的正效应。在适度点达到以前,第二种效应占优势,此时人口增长促进人均资本——产量;而一旦人口增长超过适度点,则第一种效应占优势,进一步的人口规模膨胀将会降低人均收入。^①

上述观点没有考虑到适度人口变化的条件,基本上属于静态适度人口论的范畴。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 H. 西季维克(H. Sidgwick, 1838—1900),他认为当土地-劳动比例增长到一定点之后,劳动生产率会趋于下降;人均收益最大点是与技术状况、资本积累和知识进步等因素相联系的。这种观点被认为是提供了动态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前提。

此后,英国人口学家 A. M. 卡尔桑德斯较系统地阐述了经济适度人口理论。他认为,人口适度数量的标准是经济标准。他还提出了适度人口密度的理论。所谓适度人口密度,是指一个国家人口在所支配的环境范围内,达到居民获得最好生活水平的人口密度。对适度人口密度的考察,要考虑环境、已经采用的技术水平及民族风俗习惯等因素,能够提供按人均最大收益的人口数量。这个人口数量是随着有关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他还指出,理想的人口密度取决于应用技术和知识的程度。至于人口适度密度和过剩人口的关系,他说,出现过剩人口是因为生产方法没有改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适度密度不能保持,人口增长超过了适度密度。同时他认为,劳动力的失业现象不是由人口过剩而是由人口过密造成的。实际上,他忽视了人口过剩与人口过密都是表面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

早期经济适度人口学说是继马尔萨斯之后适应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发展趋势而产生的一种人口经济理论,经济适度人口学说为人口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但它假定人的知识和科学技术等条件不变,对人口数量和生产收益等因素做静态分析,因而只是一种静态的经济适度人口理论。

二、现代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现代经济适度人口学说以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 1898—1990)出版的《人口通论》为代表。该理论从动态角度分析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说明人口增长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以及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最适宜的关系,寻求适度人口增长率。

^① 李竞能. 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288.

(一) 静态经济适度人口

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在分析人口经济效应时,把经济目标作为确定人口数量的标准,以此来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适宜关系,这就是经济适度人口论。所谓经济适度人口是指其他经济条件均相同时,达到每人平均产量最大值的人口规模。有关经济适度人口研究所使用的标准较多,如经济福利、收入、最高生产率、边际生产率、就业水平等,但许多人认为把每个人平均产量作为福利指标和最大化目标来探讨经济适度人口较为合适。有人主张用人均收入来替代人均产量作为计量标准来探讨经济适度人口。这样,经济适度人口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达到每人平均收入最大值的人口规模。

索维考察了两种静态适度人口:经济适度人口和实力适度人口。所谓经济静态适度人口,是指不考虑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等因素的变化,仅仅分析最高生活水平和边际产量相一致时的最佳人口规模,图 1-2 是静态经济适度人口的典型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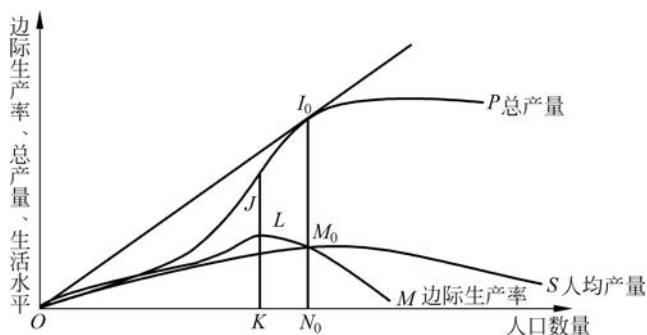


图 1-2 边际生产率、总产量与生活水平测定的经济适度人口

在图 1-2 中,横轴表示人口数量,纵轴表示生活水平(人均产量)、总产量和边际生产率。 OP 表示随着人口变化而变化的总产量曲线, OS 表示随人口变动而变化的人均产量曲线, OM 表示边际生产率随人口变动而变化的曲线。当人口达到 K 时,边际生产率 OM 达到最高点(L), OK 表示边际生产率最高时的人口规模。与边际生产率 OM 最高相对应的总产量落在 J 点。但此时总产量 OP 和人均产量 OS 并未达到最大, M_0 是人均产量最高点,即人均生活水平最高点,此时边际产量(边际生产率)曲线 OM 与人均产量曲线 OS 相交于 M_0 ,此点对应的人口数量为 ON_0 。如果以人均产量最大为适度人口的标准,则 ON_0 为经济适度人口。如果边际生产率高于人均产量(M_0 左侧),则人口增长将增加人均产量;反之,如果边际生产率低于人均产量(M_0 右侧),则人口下降将增加人均产量。

索维又将经济适度人口的概念扩展到非经济领域,提出了以国力、军力来衡量的实力适度人口模型,认为实力适度人口一般大于经济适度人口。同时,索维又提出了适度人口增长率的概念,并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对适度人口的影响角度去分析,从而由静态适度人口论推向动态经济适度人口论。

(二) 适度人口增长率

在稳定人口理论的基础上,索维通过人口变动的成本收益分析,求出适度人口增长率。他认为,对于一个稳定的人口而言,人口增长可能加重负担,也会带来收益。所谓负担适用

于新增人口的附加服务设施和生产设备方面的投资,也就是为了保证新增人口拥有同原有
人口相等的生活标准而增加的资本存量,即人口投资。人口投资与人口增长是正相关关
系,人口增长越快,负担越大,所需要的人口投资越多。索维认为,人口投资的增长速度高
于人口增长。他把总负担分为两个部分:①更新旧设备的投资;②由于人口增长所增添的
资本设备。如果用 D 表示全部资本设备的平均使用寿命,且相当长, P 表示人口增长率,
并假设相当低,资本设备的成本为 1,那么和全部资本设备有关的人均负担为

$$C_p = P[e^D P / (e^D P - 1)] \quad (1-1)$$

如果人口增长率为零,即 $P=0$,则人均负担为

$$C_0 = \frac{1}{D} \quad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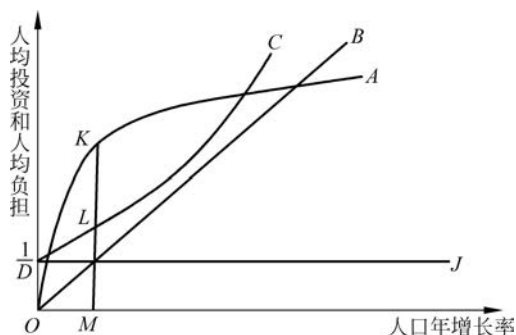


图 1-3 适度人口增长率

索维还分析了人口增长所引起的经济
效益问题。这种效益包括:第一,公共管理
费用不变或慢于人口增长;第二,规模经
济,企业规模固定时,人口增长可促进企
业竞争;第三,人口增长有利于投资偏差的
调整。他认为,适度人口增长率的确定,取
决于成本(负担)和收益之间的比较。图 1-3
说明了这种关系。

图 1-3 中,纵轴表示人均投资和人均负
担,横轴表示人口增长率, J 线表示在不
同人口增长率下的最低人均负担(或最低生
活水平),曲线 A 表示人口增长的经济收
益, C 表示人口增长的负担。该图说明了
适度人口增长率决定于人口增长所引起
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当人口增长率为零时,人口增长的经济收
益为零;随着人口增长率的提高,经济收
益上升,但达到一定点后转而下降。而
从人口增长的负担曲线 C 可看出,人口
增长率为零时,负担为 $\frac{1}{D}$;随人口增长
率的提高而负担增大。当人口增长率为
 OM 时,收益曲线上升到 K 点,而负
担曲线上升到 L 点,人口增长所引起的
收益与负担差额最大,即 KL 值最大,
所以 OM 的人口增长率是适度人口增长
率。

(三) 动态经济适度人口

所谓动态适度人口,是指技术变化、经济结构变革、就业变动等条件下适度人口量所
发生的变化。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有关假定的经济目标来说,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的变
动是最适宜的或最有利的。动态经济适度人口不是指一定时点,而是指一定时期的人
口的适度变动。这种适度变动既是人口的经济效应,又是经济变动对人口的作用。

索维在考察动态经济适度人口时,主要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对适度人口的影响这
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技术是指生产技术和消费技术。所谓技术进步,是指“在
同样多的工时(直接的或间接的)内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技术进步可以使最高人口
和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这是因为,技术进步使人们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加上必要
的制度安排,

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见图 1-4)。此外,索维还论证了技术进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适度人口数量的观点。他说,西欧几个国家在 1789—1965 年间,技术有了巨大进步,同时就业人数也有了极大增加。技术进步对欧洲人口的影响经历了两个阶段:适度人口数下降或比实际人口数上升得慢些;适度人口数上升,同时实际人口增加得比较慢。技术进步对适度人口的影响可由图 1-5 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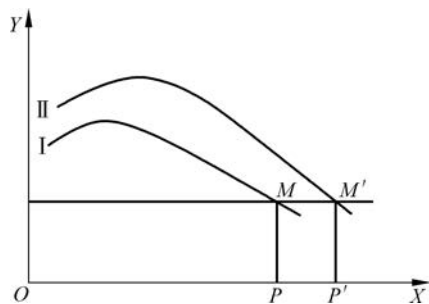


图 1-4 技术进步和最高人口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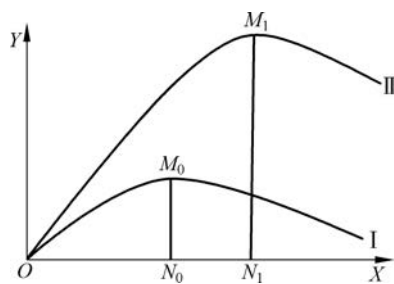


图 1-5 技术进步使适度人口提高

在图 1-4 和图 1-5 中, I 和 II 表示初始期和技术进步条件下,人均产量随人口增长而变化的情况,横轴表示人口数量,纵轴表示人均产量(或生活水平)。由于技术进步,最高人口由 OP 变为 OP' ,适度人口量由 ON_0 提高到 ON_1 。

此外,在考察经济适度人口时,索维还分析了工时、第三产业、对外贸易、职业变动等因素对适度人口变动的影响。

现代适度人口经济理论是当代人口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拓宽了人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基本上是纯推理的产物。在实际生活中,它所包含的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特别是二者相互关系的适度状态是难以计量的。^① 参见关于我国适度人口的研究(专栏 1-1)。

专栏 1-1 中国适度人口研究

孙本文. 8 亿人. 文汇报, 1957. 5. 11.

宋健、于景元. 7 亿或 7 亿人以下, 6.3 亿~6.5 亿人,《人口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85.

胡鞍钢、王毅. 15 亿~16 亿人(最大承载人口能力),《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

毛志峰. 15 亿人左右,《适度人口与控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力研究》课题组. 16.6 亿人, 15.1 亿人,《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力研究(摘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曹明奎. 17.1 亿人,《中国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和人口承载力》,《生态学报》,1993, 13(1).

^① 索维认为,适度人口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只不过是使用方便的工具而已,这种工具具有过渡性。对它的使用“就像数学家使用虚数一样”,仅此而已。见人口通论[M]. 上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55.

朱国宏. 13.8 亿~6.6 亿人, 关于中国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问题的思考,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6, 6(3).

童玉芬, 王静文, 梁钊. 临界适度人口, 2030 年 11.57 亿~13.22 亿人, 2050 年 14.65 亿~16.26 亿人. 理想适度人口, 2030 年 9.86 亿~11.11 亿人, 2050 年 11.88 亿~13.89 亿人.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适度人口研究, 《人口研究》, 2016, 40(2).

资料来源: 根据吕红平《适度生育水平: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文整理, 载《晋阳学刊》2022 年第 1 期。

第五节 凯恩斯学派的人口经济理论

凯恩斯生活的时代,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西欧、北美各国也经历了人口问题的转型, 出生率下降, 人口增长缩减。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期间, 大批工人失业、贫困是当时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就是说, 在人口增长缩减、经济发展水平已有很大提高背景下出现了新的过剩人口问题。这就要求学术界对这种不同于马尔萨斯式的人口经济现象做出解释, 凯恩斯及其学派的人口经济理论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 凯恩斯的人口经济理论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30 年之前, 他秉承古典经济学和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把人口增长看成是实际工资停滞、人们贫困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是 1930 年之后, 凯恩斯的人口经济理论发生了重大转折, 他高度关注人口增长衰减趋势, 并纳入有效需求理论之中, 成为凯恩斯革命的重要内容。我们对凯恩斯及其学派人口经济理论的介绍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而对转折之前的人口经济理论略而不谈。本节对凯恩斯学派人口经济理论的讨论集中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人口下降的若干经济后果》和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的观点。

一、《通论》中的人口经济理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是 20 世纪上半叶一位才华横溢的理论创新者, 也是当时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 1905 年毕业于剑桥大学, 当时主修数学与天文学。后来, 师从马歇尔和庇古(Arthur Cecil Pigou, 1877—1959)攻读了一年的经济学。此后, 他除了在剑桥大学执教外, 还曾担任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英格兰银行董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董事。1919 年因发表《和约的经济后果》而名声大噪。凯恩斯著述很多, 较重要的有: 《印度的通货和财政》《和约的经济后果》《货币论》和《劝说集》等。但最重要、影响最大的著作是 1936 年出版的《通论》。

在《通论》中, 凯恩斯首先对传统经济学的前提提出了质疑。他认为, 古典学派理论依存于三个假定: (1) 真实工资等于现行就业量之边际负效用; (2) 严格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并不存在; (3) 供给本身会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三者是共存亡的, 任何一个在逻辑上必然蕴含其余两个。而且这些前提, “只适用于一种特例, 而不适用于通常的情形”; 它们所假

定的情形，“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之极限点，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性，恰不是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存在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还存在第三类失业，即非自愿失业（involuntary unemployment）。而非自愿失业产生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的那一点的总需求函数之值，即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也就是总需求。“令 Z 为雇佣 N 人所产产品之总供给价格，两者之关系可以写作 $Z = \Phi(N)$ ，称之为总供给函数。令 D 为雇主们预期由雇佣 N 人所能获得之收益， D 与 N 之关系可写作 $D = f(N)$ ，称之为总需求函数。”^① 就业量决定于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的交点，在此点，雇主们的预期利润达到最大。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又是由“心理上的消费倾向（MPC）”“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心理上的流动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决定的。即边际消费倾向（MPC）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引起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

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的作用程序是，人口增长和 MPC 决定消费需求，人口增长的衰减（population declining）和 MPC 递减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递减和流动偏好引起投资需求不足，从而有效需求不足，即总需求不足不可避免。所谓消费倾向递减是指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但消费增加少于收入增加，由此导致在增加的收入中消费部分渐小，储蓄部分渐大，这是“一般心理规律”。由此造成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时如果不相应增加投资需求来弥补这一缺口，就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非充分就业。在这三大心理定律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资本边际效率即预期利润率，它不但短期内波动不定，而且在长期里有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对投资前景并不了解，他们主要是靠“自发的乐观情绪”进行投资决策，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乐观情绪减弱，信心降低，从而利润率下降。最后是“流动偏好规律”。凯恩斯认为，每个人都有偏好流动性（即各种资产变换成货币的难易程度）习惯。而货币是流动性最大的资产，所以人们一般都偏好于持有现金货币，因此流动偏好规律可以理解为货币需求。流动偏好产生于人们心理上的三种心理动机，即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前两个动机取决于收入水平，基本与利率无关；而投机动机则是利率的函数。如果利率率的下降幅度低于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幅度，将引起投资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尤为重要，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

凯恩斯认为，以前流行的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不需要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十分有害，因为那样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危机和失业持久和恶化。因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将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等各项手段，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

二、人口下降的经济后果理论

人口问题是“凯恩斯先生的王牌”（J. R. 希克斯，1936）。凯恩斯在《通论》中写到，衰退

^①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7-31.

之长短,不仅取决于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也取决于人口之增长速度。人口由渐增期进入渐减期则衰退将延长。资本边际效率的复苏取决于固定资产之寿命和某时代人口之增加速度。^① 1937年2月,凯恩斯在优生学会上发表演讲——“人口下降的若干经济后果”,不仅系统阐述了人口下降经济后果的理论,而且进一步阐释了《通论》的思想。

(一) 人口增长趋势的转变

凯恩斯首先指出,未来从不会像过去。但是,我们通常假定,未来像过去一样。直到今天,我们的思想有时还受到某些诸如伪理性主义的影响。凯恩斯特别强调了习惯的重要性,我们假定未来很像过去是合理的习惯——人们不得不依之行事的行为习惯——正如我所认为的那样,它继续影响我们的思想,即使在有充分理由预期到肯定发生的情况下亦如此。我们对未来最有把握的也许非人口发展趋势莫属。与过去几十年人口持久而又急剧的增长不同,我们将面临一个静止或下降的水平。下降速度虽存分歧,但与过去我们已经习惯的情况相比,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客观事实。由人口增长到下降所产生的后果可能滞后,但可预测得到。这就要求我们不能采用以往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来考察未来的人口问题,要特别注意人口下降的经济后果……

凯恩斯指出:“一个正增长的人口对资本需求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除了技术变化和生活水平提高外——增加或多或少与人口成比例,而且工商企业的预期更多依据现在而不是未来的需求。在人口增长倾向于促进乐观主义的时代,一般说来,需求总是趋于超过而不是低于预期,而且在出现资本暂时过度供给的特例时会得到迅速校正。但在人口减少的时代正好相反,需求趋于比预期低,过度供给不易校正。因此悲观主义的氛围可能产生。而且,尽管在长期持续的悲观主义氛围中,可以通过它对供给的影响来校正自身,人口增长趋势改变引起繁荣的第一个结果可能是大灾难。”

(二) 人口增长、技术变化、生活水平和资本需求的关系

凯恩斯指出,资本需求取决于人口、生活水平和资本技术三个因素。所谓资本技术,就是西方经济学常常提到的资本系数,凯恩斯说,为便利起见,我把它称为生产时期(the period of production)。换言之,资本需求取决于消费者人数、平均消费水平和平均生产时期。人口增加依比例地增加资本需求,而且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依靠发明和进步。然而凯恩斯认为,对于发明要做具体分析,要考察发明的类型和时代特征。19世纪上半期,发明主要集中在高度耐用的资本货物上,因而对资本需求较多,而现代发明多属于资本节约型。如果消费者人数下降,那么我们不能幻想对任何生产时期的显著技术进步,对净增资本品的需求将完全依赖于平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或利息率的降低。如表 1-2。

基于表 1-2 的资料,凯恩斯指出:“资本需求的增加,主要归因于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在很少的程度上归因于技术变化,这种技术变化有助于单位消费资本的增加。”凯恩斯进一步说明,资本存量的增加有两个主要来源,其中的每一个大致相等:用于满足一个正在增长的人口需求略低于一半,满足发明和增加人均产量和允许更高生活水平的需求略高于一半。也就是说,对新资本的需求主要由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较多

^① 参见《通论》“略论商业循环”一章。

使用资本而较少使用劳动的发明,会导致资本产出比更大比例的增大。而节约资本的一些发明切断了一条通道和其他一些东西,而且并非如此清晰——假定利息率不变,即发明的净结果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改变了单位产出的资本需求。

表 1-2 英国 1860—1913 年的资本增长与人口等因素的关系

项 目	1860 年	1913 年
实际资本	100	270
人口	100	150
生活水平	100	160
资本技术	100	110

资料来源: Keynes, J. M., Som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 Declining Population. *Eugenics Review*, April 1937.

因此,确保常年均衡的条件是,改变我们的制度,降低储蓄率,财富分配更加平均,或者大大降低利息率,使之在技术和消费方面多使用资本以有利可图。

(三) 两个魔鬼的理论

两个魔鬼的概念既反映出凯恩斯人口经济理论与马尔萨斯的不同,又反映出二者的渊源。二者都渊源于马尔萨斯,因此又称“马尔萨斯的两个魔鬼”。一个是指“过剩人口的魔鬼”(devil of over-population)或“马尔萨斯人口魔鬼”(Malthusian devil);另一个是指“失业资源的魔鬼”(devil of unemployed resources),又称“马尔萨斯失业魔鬼”。前者是马尔萨斯对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初欧洲存在着大量过剩人口的一种形象描述。依据“两个级数”的原理,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过剩是由于人口本身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长,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并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后者是凯恩斯针对“大萧条”后出现的经济发展停滞和大量失业人口的局面提出的。之所以也称之为“马尔萨斯魔鬼”,是因为马尔萨斯也说过有效需求不足会引起经济衰退和失业。凯恩斯认为,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增加投资和消费才能实现,虽然人口缩减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使失业人口增加,并产生比过剩人口更加厉害、更难驯服的“失业魔鬼”。凯恩斯的结论是:当今“马尔萨斯魔鬼 P”被锁起来了,“马尔萨斯魔鬼 U”又破门而出。当“人口魔鬼 P”被锁起来时,我们虽然一度解除了一种威胁,但是我们又遭到另一个“失业魔鬼”的威胁,并且与以前相比,这后一个威胁有增无减。因此,他呼吁采取措施防止人口减少,减轻人口减少的威胁。

三、汉森的人口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人口经济理论首先为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汉森(Alvin Hansen, 1887—1975)所继承。汉森主要关心宏观政策和经济稳定,他著作的核心是充分就业以及通过财政政策达到这一目标。^① 根据《经济进步和人口增长下降》一文,汉森的人

^① 参见 R. A. Musgrave 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2 卷)所写的词条 Hansen, Alvin.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6: 636-637.

口经济理论包括如下内容。

(一) 人口从快速扩张到停止增长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

汉森发现,当前(1938年)人口增长率正在经历巨大而显著的变化,但很少有经济学家关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十年中,美国人口增加了1600万。而在当前的十年,仅增加了一半的数量。基于马尔萨斯理论的传统,经济学家对人口停止增长予以乐观解释。但否认人口迅速膨胀到停止增长所蕴含的意义,否认本可通过适当的经济政策应对变化,以避免或减缓严重的结构失调。这是“毫无根据的乐观”(an unwarranted optimism)。因此需要从马尔萨斯的巢臼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到亚当·斯密曾提醒的地方,对经济进步、资本形成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彻底研究。所以,他将经济进步的构成要素分三大方面:①发明;②新领土和新资源的发现和开发;③人口增长。其中的每个因素顺序地、各自地抑或综合地打开了投资通路,引起资本形成的快速增长。技术进步、新产业的开发、新资源的发现以及新领土的开放(the opening of new territory)是繁荣的基本原因,反之则是萧条的根源(the progenitor of depression)。

汉森认为,资本形成可采取资本深化(a deepening of capital)或资本广化(a widening of capital)的形式。深化过程意味着单位产量使用了更多的资本,而广化过程指的是资本形成与最终产品的产量一同增长。如果实际的资本—收入比保持不变,那么没有资本深化;但如果这个比率不变而实际收入上升,那么就有一个资本广化。人口增长与资本深化和广化是什么关系呢?它在其中起什么作用?汉森认为,资本广化是最终产出增加的一种功能;反过来,最终产出增加部分原因是人口增长、人均生产率增长,这些原因的出现不是单位产量使用了更多资本(即资本深化)。另一方面,资本深化部分原因是技术变化引起成本下降,部分原因是利息率的下降,部分原因是整个产出特征的变化,特别是关于为生产产出所需要的资本数量。在现代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资本深化和资本广化过程是同步发展的。但从整体经济看,在其后阶段,资本深化的过程迅速减弱(rapidly diminished)。而且现在随着人口增长的迅速停止,甚至广化过程也可能放缓。此外,资本节约型发明(capital-saving inventions)可能引起许多产业的资本形成落后于产量增长。

(二) 人口增长速度决定产出特征,影响最终产品的构成

一个迅速增长的人口对新住宅的需要比静止人口大得多。老年人比例高的静止人口也许需要更多的个人服务,而且消费需要的构成对资本需要量有一个重要的影响。住宅需求要求的投资量巨大,而个人服务需求在没有大量投资支出的情况下仍可得以满足。因此,从迅速增长的人口到静止或下降的转变可能引起消费品流量最终构成的改变以至于整个经济的资本产出比下降,资本形成和实际总产出以同样的速度增长。19世纪后半期,西欧资本形成的40%、美国的60%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实物产出(physical output),西欧年均3%的增长率,归功于人口增长的不足一半,美国归功于劳动力供给增加的高于一半。可见,由于人口增长急速下降,减少的投资是多么巨大,对实物产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影响资本形成,进而导致失业和经济的长期停滞。

人口增长影响资本形成最直接的领域是建筑业,特别是住宅。几十年来,居民数量的增长与人口增长一直维持着密切的关系。而在20世纪的前十年,住宅增加了25%,住宅和

人口比例的增长超过了前十年。

(三) 人口增长下降与长期停滞

革命性的新产业,如汽车或铁路,经过初期发展到成熟以后,其投资活动有一个巨大的向上涌动。当达到成熟期并停止增长以后,所有产业、整个经济都必将经历巨大的停滞,直到出现新的开发。由于资本更新,微小的复苏迟早会发生,但全面复苏要求的不仅是单纯的折旧基金。它要求新投资更多,以及等待新产业和新技术的开发。人口增长下降、大量充足的吸收资本支出的重大创新项目的失败,这些综合因素对解释近来达到充分就业的复苏失败有很高权重。几乎停止的人口增长与新领土的定居和开发的消失可能削去过去背景下投资的一半或一多半。由于人口静止,我们只需用过去一半的投资来维持和过去同样的人均收入。在技术进步和新产业开发不足的背景下,保证充分就业可以采用各种措施:减税以刺激消费,对人和自然资源以及服务于整个社会的物质、娱乐和文化需要等以集体为特征的消费品的公共投资。按照这一思路提出解决经济和政治管理问题的方案。这个通过税收还是借贷融资的方案能否对自由企业制度无副作用,将是严肃的经济可行性和政治管理(economic workability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问题。至于日常的经济生活,我们将遇到一个困境,个人投资不足导致的大规模失业,迟早会导致一个全面的集权经济(regimented economy),同时也会导致公共支出的极大扩张。汉森反对持续的政府支出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如果政府以高比例进行持续投资,就等于反对私人投资。这样容易形成高成本和高价格。公共开支是所有复苏措施中最便利的一种,但潜伏着危险。如若走得太远,我们会忽视具体失调问题的解决。如果经济学家不能解释正在迅速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那就是失职。不能揭示潜伏在政府扩张活动中可能的危险,同样是失职。人口增长迅速下降的伟大转变及其对资本形成和自由企业制度的影响,对社会科学的探索提出了更高要求。



主要概念

人口与经济的古典理论 人口与经济的新古典理论 马尔萨斯 马歇尔 凯恩斯
坎南 适度人口 经济适度人口



思考题

1. 试述古典人口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内容。
2. 亚当·斯密人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试评述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
4. 试评述适度人口理论。
5.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说,人口问题既是凯恩斯先生的王牌,也是理解《通论》的枢纽,谈谈你的理解。

6. 凯恩斯和汉森是如何分析人口趋势转变的经济后果的? 试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比较与评述。

参考读物

